



周汝昌梦解红楼

周汝昌 著 周伦苓 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周汝昌梦解红楼

周汝昌◎著 周伦苓◎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汝昌梦解红楼/周汝昌著;周伦苓编.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447-1723-6

I. ①周… II. ①周… ②周…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2524号

书 名 周汝昌梦解红楼

作 者 周汝昌

编 者 周伦苓

责任编辑 韩继坤

特约编辑 李 静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263千字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723-6

定 价 3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提“梦解红楼”，也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小故事：

1953年之秋，《红楼梦新证》在沪出版，顿时引发了海内海外空前的，也是名实相副的“轰动”。我那时在成都做教师，在外文系教翻译，老同窗许兄政扬就将北京的消息及时传给了我；其一叙写各种佳话时，讲到启功先生，说他见了《新证》十分高兴，表示“我要画一幅《周公解梦图》”。

原来，自古流传，西周文化创始人周公（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已发现铸有周公名字的甲骨文），是“演《易》”和“解梦”之大圣人（和孔子并称“周、孔”），民间有“周公圆梦”的书，说他能解译梦境的征兆意义。这是“解梦”的最早史话。所以启先生那时的一席话，即巧用双关的妙语——那“梦”，自然是指“红楼”之“梦”了。

如今因为这本小书命名，于是想起要讲“解梦”，当从这儿引起。

“解”，今日时尚语言似乎就是“破译”之意。报纸标题，为了“吸引”看报人，不时可见“解（揭）开××之谜”的措辞。但我这里借用此字，却不是为了“吸引”什么，倒是时常想着雪芹书中的原话：“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那个“解”，乃是“懂得”、“理解”、“晓悟”之义，虽然也与“揭开”可以关联，毕竟侧重在神智上、文化上感受和领会一层要义，不是要引起什么“轶闻效应”。

先说明这一点，可免误会。

本书收录了大约80篇谈红说梦的随笔文字。回顾过去数十年所写《红》文，有些是“学院派”的所谓“论文”，学术性强，表达方式不通俗，带着“学

问腔”，一般读者并不爱看。《红楼》文笔奇妙，需要“奇文共欣赏”，须有“每有会心便索然忘食之乐”，方是读《红》的真正享受处。因此，我也喜欢写这种文章，以为更适于遣怀抒感，更便于与读者沟通交流，共得其乐。

基于以上拙想，也承应不少读者报函，特别是女儿伦苓的提议，遂将适合这种性质、文体的历年习作尽可能地搜辑，由伦苓整编纳于一帙之间，可省检觅之劳烦，可供“独坐”之遣兴，更可引发由这些浅显的生活现象、文化课题而进入高层次的思索和研求——那么，这个“解”就不是单方只由作者来“破译”什么奥秘，而是著与读双方共同“索而解”的事情和乐趣了。

还请勿忘：我们中华文化文学传统，从来最重“解人”这一词义。用今天的话来说，雪芹作书开卷不久就先关切着有无“解人”这件大事。“谁解其中味”，即谁可为我这《红楼梦》的“解人”？——即能读懂我之旨义精神的“会心者”？所以，轻下一个“解”字，实在太孟浪，太不自揣：我们有资格充当一个能“解”之人吗？

言念及此，惭颜自哂矣。

再者，“梦解红楼”，四字如此安排，亦颇费苦心。这种句法较为灵活，你可以读作“睡里梦里都在为红楼求解”，也可理会为“梦中说梦倍辛酸”（陈寅恪先生诗句），或者就是“梦想”、“妄想”要强解《红楼》。若如此，这书名取得就更有自嘲语味了。

一位不相识的远方投函者，寄来一张明信片，首尾不具，只言：“爱读您的书，爱听您的课（电视讲座），谢谢您，辛苦了。”语少而情真，让我感动，让我鼓舞。

这样的“知音”遍天下，不能尽举；为了他们的热诚好意，我将自己这些拙文结集成编，聊为答报，料想定会得到友声，兼予切磋，不胜欣幸之至。

诗曰：

梦解红楼日月长，奇情异彩细参商。

零笺碎墨皆堪念，中有微怀一瓣香。

承蒙好友丁羲元先生出示珍藏《红楼》名画家改琦之佳作，允作插图，光我篇幅，谨致以深衷谢意。

甲申十月小阳春写记

目 录

自 序	1
我与《红楼》有夙缘	1
借玉通灵存翰墨 为芹辛苦见平生	5
不悔——知愧	13
不离本行	19
研红良不易 一得贡真愚	22
考证之乐	30
触类旁通	35
楝亭四像一无踪	39
应识灵山	42
“六朝人物”说《红楼》	45
青石板的奥秘	48
龙年与曹雪芹	52
雪芹曾客“富儿”家	56
佟·傅·李与天津	58
长安·种玉及其他	61
曹雪芹生于何月	65
曹雪芹的“用典”	69
“诗礼簪缨”有埋伏	72
从《红楼》到康熙	74
“情教”创者曹雪芹	77

情在《红楼》	80
《红楼梦》食谱闲话	86
《红楼》饮饌谈	89
《红楼》花品	95
雪芹笔下有名花——海棠	100
怎么写宝玉	112
从衣饰到神采	115
《红楼梦》中的女性美	119
“西府”的谜底	123
“红楼”本是燕京典	125
红楼迢递认燕都	127
《红楼梦》与满俗	134
恭王府传奇	141
莲池北岸的天香楼	147
藕香名榭在津门	149
“自传说”能成立吗?	151
脂砚即湘云	154
林黛玉的《庄子》是什么版本	159
《红楼梦》的流行	162
关于甲戌本《石头记》	165
芹溪与玉溪	168
不敢提芹字字清	172
《红楼》章法是神奇	174
过场人物乎? 结局人物乎?	177
“花主”“花王”气味殊	180

冒烟含露见颦颥	184
《红楼梦》欣赏一隅	187
脂砚小记	194
绛珠草·文化教养·化缘簿	199
潘霍芬与太虚幻境	202
多少楼台烟雨中	204
雪芹·水星·红祠	207
竞病·丕兴·芹庙	210
甲戌本联系三奇女	214
张爱玲眼中的《红楼梦》	217
字比笆斗大	221
齐白石与曹雪芹故居	229
上元佳节访芹居	232
胭脂米传奇	234
“红楼升官图”	236
雪芹印章·印缘小札	240
念芹重建大行宫	242
青史红楼一望中	247
黄叶山村入画图	255
西山寻梦	258
一帆风雨路三千——探春远嫁	263
云散 水流——黛玉自沉	266
薄命女——香菱	269
秦可卿	271
贾元春	274

给“老外”讲《红楼》 278
《红楼梦》世界语版序言 282
美红散记 290
域外红情 308
“红楼梦”解 323

我与《红楼》有夙缘

我家与姥姥家都是“海下”养船的人家，母亲姓李，纯粹旧时家庭妇女，没有名字。母亲为独生女，当时她还没有赶上有“女学校”的时代，自幼深慕读书的堂兄弟们，偷听他们念书的声音，能仿效当时学生朗诵诗圣杜甫的五言律诗的声调——北方特色的抑扬顿挫的“美读”法。她因此发奋自学，竟能阅读一般的小说、唱本，也能学戏台上的唱腔。一句话，她是个酷爱文学艺术的村女。

重要的是，她有一部《红楼梦》。

奇怪的是，她的这部书（还叫《石头记》的版本）竟是日本版！

我第一次看《红楼》，就是看母亲的这本《石头记》。

怎么是日本版？原来，这书是她堂兄（我的大舅）在她出阁之后，前来看她时，给她带来的礼物。那是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母亲年方二十。那书是绿色布面，精装上下两册，带批语、绣像。

我那时太小，看不懂，就丢下了。

母亲却津津乐道，常提《红楼梦》的名字，讲给我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向我追述早先我家盛时的一些往事。我家曾有一个傍河依水的小花园，有小楼，有花木，大树很古老，百花竞放。爷爷很爱惜，也很得意。春秋花盛时节，各院年轻的女儿、少妇们，盛装打扮，花团锦簇，到园中去看花。母亲追述这些，就是为了一段话：“那时家里的姑娘媳妇们，穿的戴的，打扮的，真是好看极了！我们一群，一齐来到园子里，那真像《红楼梦》里的那么好，那么热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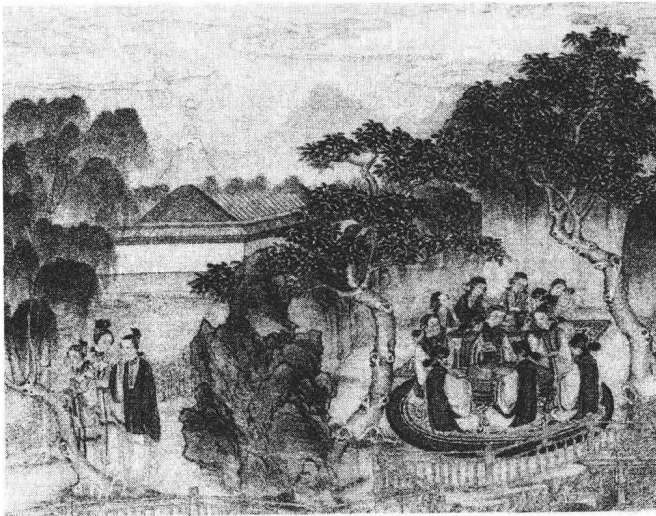
我听得神往——可又似懂非懂。

但是，这种追述，对我来说，也就是一种熏陶。从此种下了很深的“缘”源因子。

我长大了，家境比母亲追述盛时的那年代更败落了，园子也被族中败家子弟拆毁，卖了“材料”。

我上大学了……沦陷了……重返学校了……我在校学西语，志向是精通外语，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华文化、文学名著——我在南开高中时英文成绩就过得去了，英译过冰心女士的小说……暗自立下一个志愿：准备英译《红楼梦》。我和黄裳（散文名家）是同屋同窗，每晚墙子河边散步，二人热烈讨论的主题不是别的——就是《红楼梦》。

经历沧桑，重返燕京大学，我已年龄“老大”，心情十分抑郁，郁郁寡欢。这时，四哥枯昌在家乡读三哥泽昌的旧书，因三哥少年时是个小说迷，当然也就有《红楼梦》等等有关的“闲书”。四哥因而重看起《红楼》来了，对作者曹雪芹之为人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与求知欲，就写信给我，希望我对他（雪芹）作一番考察。



这一封信不打紧，却一下子引发了我这个早先读不懂芹书的人的极大兴致，一头扎进“红学”的无边乾坤里去了！

从那以后，我与四哥两个人在四十几年里，无有一时一刻不在为考芹研《红》而努力。什么困难险阻、挫折中伤，都没能使我们二人改变初衷，失去信念。

我与《红楼》的夙缘，始于家庭母教与手足之情，但更始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极深至厚的培育灌溉。

再说我的母校燕京大学，没有那样的学术环境，我是无法做红学功夫的，特别是那座了不起的图书馆，凡是我想用的书，那儿几乎一索即得，那藏书太富了！可是，只没有《红楼梦》的好版本。后来，经过我的提议与张伯驹先生的努力，使得珍贵的“庚辰本”成为馆中珍笈——彼时的情况，那种古抄本无一人重视，任其流落湮没，如不得入此名馆宝库，其命运真不堪设想，难以揣量了。

“庚辰本”，我得见的先是一部珍秘的照相本，已在我得见“甲戌本”之后。“甲戌本”是胡适先生的珍藏，世间首次复现的乾隆精钞朱批、未经高鹗等篡改的《石头记》原本，中华无价之宝。我与胡先生素昧平生，斗胆借阅，他竟立即托小说专家孙楷第先生捎给了我，报纸包着，上以浓朱笔写我的姓名和“燕京大学四楼”。那年暑假，我与四哥拿定主意，为保护纸已黄脆的原本，全力经营，钞出了一部副本。

后来，北平和平解放之前，情势不可预卜之际，我想把这珍本交还物主，因为人家胡先生自从借与我，从未催询过一字，这种对一个陌生的学生的信任，世上少有，我不能做不道德的“攘为己有”的昧心之事，就专程送还。到了东城东厂胡同一号，出来的是他的长公子，将书收到手中，我不入门而告辞。事后很多年方知，那时胡先生正要坐南京派来的专机飞离北

平，临走只携带两部书，而这部古钞“甲戌本”竟是其中之一！

以后，台湾首先影印了它。今年适逢甲戌年，乃“甲戌本”诞生 240 周年，台北寄来请柬，方知高校学府将于六月举行甲戌年纪念研讨大会。这不禁使我忆起了上述的种种情事。

我与四哥为了大汇校，写定一部真本，聚集了一些历年搜得的比较难得的本子，也包括胡适惠借的大字“戚序本”。未及“文革”，大约是“破四旧”时，四哥正在运用的那些本子全部被“抄”走了，至今不知被谁饱入私囊。母亲的那部启蒙的《石头记》，因为存在我处，却得以幸存，但是总不忍翻阅了。

我与《红楼》有夙缘，真是三生之幸。

借玉通灵存翰墨 为芹辛苦见平生

和红学结下因缘，从明确的意义讲，总在三十年代。二十年代的我，还看不懂《石头记》——开过几次头，都读不下去，只好掩卷收书而罢。但在初中时候，胡乱学写诗词，那种令和七言歌行，却都不是直接来自宋篇唐句，而是带着一眼可见的《柳絮词》、《葬花吟》的影响痕迹的“学语”之作。其时年龄十三四至十五岁之阶段也。到了高中时期，是在有名的南开中学，和老同窗黄裳兄住同屋（那时还叫做“斋”，这宿舍名称包含着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饶有意味）。我们二人，志趣略同，都酷爱文艺，每日晚饭后，情意悠闲，风日晴淑，例至校外散步，直走到墙子河畔为度，饱领落日归鸦之趣，霞天散绮之奇。我们不光是走，嘴里当然在说笑，不知怎的，话题往往落到《红楼》上来。这毕竟所因何故，今天我已解说不清了。而且所谈的到底涉及哪些点或面，也是不能追忆的了。只记得曾论及一义：像《红楼梦》这样的中华文学菁华，必须译成一部精确的英文本，使世界上的读者都能领略一二。于是，黄裳兄遂发一问曰：我们有“红学”这个名目，可惜外国还不懂得，比如英文里也不会有这个字呀，这怎么办？我当即答言：这有何难，咱们就能造（coin）一个新字，就是“Redology”！他听了大笑。

此情此景，如在目前，而年华一箭，早是五十来年过去了。黄裳兄给香港报刊撰小文，好像也提到过我们两人南中晚步的往事（他指出我对研红的规模意度大致已具于彼时了），不过他未必涉笔及此——创造英文“红学”的掌故。至于“Redology”这个字，迟早会收入《牛津大词典》的，对此我曾说过我是相信不疑，无须多说的。

那是三十年代。我和他因九一八侵略炮火流离星散，不相闻者十余载。到我们再通信，已经是全国解放了——那是他因见《燕京学报》上有我写的《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一文，将其中一节文字（可能是第二节“脂砚斋”吧）转载于上海《文汇报》，来信告知于我，并附有晚报所刊读者撰文表示赞同的资料。他对我的研红事业始终关切，并且在每一个进展阶段上都以不同的方式支助于我——但我此刻要表的，还不是我们两人的学谊交期（因为实非数言可尽，须俟专文）；如今借此也可说明，我这个人，虽然确实比有的人是“余生也晚”，但比他们开始研究红学要早三四十年的呢。

但《红楼梦新证》落笔却晚多了，实撰于1947至1948年，当时被认为是一部巨著，倘若核实了，却只是一个学期的课余和两个暑假的时间。那真正是因陋就简，草草成篇。因为那时正写西语系的毕业论文，而题目又是向西方介绍陆机的《文赋》，所涉甚繁，本不能精心专注，一力研红，何况一个基础不佳、八年沦陷、学殖荒落的我，又怎能在此时此际写出比较理想的红学著作呢？然而就是这样一本书，也发生了不小的影响。红学界对它颇有一些评论，无论毁誉，当然都是对它的不弃和关注，志而弗谖；但能从红学史的发展角度来论述它所给予后来者（1953年以次）的影响的，却不多见。比如，研论红学史，而只会就事论事，就书论书——都是当作个别的、孤立的事物去处理对待，而不知道应该着重指明一部著作的来龙去脉，它的历史位置和作用影响，那就失去了史的性能职责。对《新证》的评价，最近却有周策纵教授的一句话，他说：“自从‘五四’时期新红学发展以来，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我们对《红楼梦》和它的作者、编者和批者的研究，已进步很多了。这期间，周汝昌先生1948年起草、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无可否认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曹雪芹小传》序）这样的评价，我在别处是没有听到过的，自然也倍感

惭愧；不过，周策纵教授是一位在国际上有声望受尊敬的学者，我们此前并不相识，用金钱、势力、情面等物向他索买颂语谀词，是办不到的。他那一句话，语有斟酌，字具斤两，包括着具体内涵而非一般泛泛之言可比，我虽愧难克当，却也仔细地想了一番，体会他学力与识力的高度。我以为，最主要的就是他不同于那些就事论事派，而是从史的角度（同时也是一种高度）去看问题，因此他第一点就指明：自从有了《新证》，现代红学才进入又一个新的时期。他实际是说：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后，新思想新文化的潮流把旧来通俗小说的身价提高了，胡适于1922年即进行《红楼梦》的考证工作；如从1922年算到1951年我将《新证》全稿交出版者，正好经历了三十年的时间；从《新证》出现以后，红学（严格意义的红学，不包括一般小说学家对《红楼梦》的赏析评议之类）才真正向前阔步前进。只有从这一历史眼光来看问题，始见周策纵教授之洞明红学，深具史识。所谓划时代，就是说，如果没有某一种事物，就不会迅速涌现随它之后的各种事态的进展。《新证》所考明的事实与所提出的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的红学的重新兴旺，《新证》以后的红学著作，几乎没有一部不是可以在其中看得到《新证》的营养和启发的，包括那些驳难、攻击和毁谤《新证》的文字中所表现的红学知识和观点。周策纵教授用笔点出：“汝昌在考证方面给红学莫立许多基础工作，在讲论方面也引起了好些启发性的头绪。”这都不是所有的人所能看到或者愿意承认的。

比如，搜集、整理雪芹家世资料而加以考订的，不自我始，但《红楼梦》的真正的时代背景，曹氏这个家族在清代史上的身份地位，曹李两家与皇室的实际关系和他们承政局变故而遭受的后果，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当时清朝统治的分化，满汉民族文化的汇合，以及所有这些时代条件所给予曹寅、曹雪芹的思想影响，《红楼梦》这部